



4

灌云报

GUANYUNBAO

责任编辑 侍述清 陈洪艳

往事·网事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编辑电子邮箱: gyssq@163.com

关注“今日灌云”微信公众号 掌上阅读《灌云报》



町店战斗:设伏歼敌的典范

1938年6月，中国军队发起了侯马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率部做好战斗准备，打击与牵制驰援侯马之日军。1938年7月，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在山西阳城町店主动设伏，痛歼日寇，取得了辉煌胜利。此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激发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和民族斗志。

配合侯马战役，八路军主动设伏

1938年4月，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在参加粉碎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后，转移至长治进行整训和群众动员，经过宣传发动，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不到两个月时间，第344旅扩充兵力3000余人。同时，广大指战员刻苦训练军事科目，不断提高杀敌本领。

在整训工作卓有成效推进时，6月，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第14集团军对侯马日军发动进攻，侯马战役爆发。在中国军队的持续打击下，日军进退失据，不断向驻守晋城的日第108师团求援，日第108师团急令第25旅团机械化联队赶赴侯马救援。为减轻正面压力，卫立煌请求八路军总部出兵阻敌增援。为了抗战大业，八路军总部同意了卫立煌的请求。6月30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344旅赶赴阳城，隐蔽设伏，伺机歼敌。接到命令后，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立即率第687团、第688团与新兵营组成的1个加强支队，从长治出发，经高平向阳城进军。六月的天气，阴晴不定，时而烈日当头，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但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咬牙坚持，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7月1日夜，按时到达阳城以北10公里的町店北山，并将指挥部设在一个叫苏家岭的山洞中。

有些险非冒不可

町店地处芦苇河畔，南北两面是山，地形险要，晋（城）侯（马）公路穿村而过，也是晋城日军增援侯马的必经之地。只要控制了南北面上山的制高点，如日军经过町店地区，我军可居高临下，打它个人仰马翻。7月2日，344旅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徐海东对敌情和战场环境作了详细分析，认为日军自恃装备精良，且接连获胜，已变得骄狂无比，目空一切。只要利用日军的骄横麻痹心理，在芦苇河畔预设阵地，把工事构筑在路边200米至100米处，隐藏在敌人鼻子下面，待敌靠近时，一定能打它个措手不及。

针对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的“如此伏击太过冒险”的说法，徐海东形象地说：“打仗本来就有风险，有些险冒不得，有些险非冒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不冒，那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了，还有什么好戏看吗？”他接着说道：“敌九路围攻晋东南失败后，更加阴险狡诈。但是芦苇河一带属丘陵地带，敌人可能麻痹，只要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抓住战机，就能够打胜这一仗。”徐海东的耐心讲解使指战员统一了思想，接着，围绕作战方案作了兵力部署，决定：第687团第1营、第2营控制町店以北富家坪和东南的北庄一线高地；第688团第1营、第2营占领下黄岩以北松树岭、东圪塔一线高地，担负攻击町店和上、下黄岩日军的任务；第687团第3营控制町店东南美泉村公路两侧高地，打敌增援。

我军出其不意，痛歼日寇

按照作战部署，第344旅指战员不辞辛劳，7月5日，防御工事构筑完成，万事俱备，只待日军上钩。6日10时许，炎炎烈日肆意烘烤着大地，第344旅指战员在工事里忍着酷暑高温，严密地注视着前方。忽然一名前哨阵地战士气喘吁吁跑来，向旅长徐海东报告，“首长，鬼子来了”。只见日军黑压压一片，他们分乘50余辆汽车，另骑兵一部，由晋城方向气势汹汹奔来，徐海东吩咐指战员密切观察敌情，耐心等待命令。11时，日军骑兵到达上、下黄岩，主力进至町店附近。天气炎热，加上长途行军，日军饥渴疲惫，看到河水，立即来了精神，就地休息起来。骄横的日军根本料不到八路军会在芦苇河畔设伏，他们放松戒备，架起枪支，有的斜靠在树干上打盹，有的跳进河里洗澡。看到日军疏于防备，徐海东命令指战员依托地形、地物，匍匐前进。待距离日军不足百米时，他一声令下，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群。一时间，战场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日军遭突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第687团通过町店迅速冲向芦苇河，在河中洗浴的日军大部未来得及反应即被消灭，其余日军见势不妙，向芦苇河南岸溃逃。但很快日军稳住了阵脚，然后凭借火力优势对我军实施压制，并图谋控制南塘沟高地，围绕制高点的争夺，敌我展开激战。我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发起一次次进攻，刺刀寒光闪闪，威慑敌胆，日军开始溃退，我指战员乘机控制了南塘沟高地，并将日军挤压在狭窄沟底，然后居高临下将手榴弹狠狠砸向敌人，歼灭日军100余人。与此同时，第688团指战员将上、下黄岩的日军分割包围，并对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日军骑兵，日军纷纷中弹落马。

但清醒过来的日军随即发起反扑，为减少伤亡，第687团、第688团边打边撤至町店北松树岭，利用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日军如发了疯的野兽，纠集残兵，集中所有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向松树岭阵地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霎时，子弹横飞，砂石飞溅。广大指战员利用山沟、田埂作掩护，顽强阻击敌人。其中，第688团第2营第6连连长郭本银，隐蔽在巨石后面，凭借过硬的射击本领，用10颗子弹消灭了10个敌人。日军不甘失败，一个小队长举着战刀，驱使日军往上冲，郭本银见状，举枪瞄准，一枪将小队长击毙，见到指挥官被打死，日军一窝蜂退了下去。战斗至19时，我军连续打退日军8次反扑。

第687团第3营也成功完成了阻敌增援的任务。为解町店日军之围，15时许，周店日军1个大队赶来增援，被第3营牢牢钳制在美泉村附近，日军发起多次猛攻，我军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日军数次进攻。18时，沁水日军一部增援町店，344旅指战员予以重大杀伤后，于20时撤出战斗。

町店战斗是八路军115师继平型关大捷之后的又一场胜利。此战，我军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这次战斗，迟滞了日军向侯马的增援行动，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在侯马地区的作战，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贪污公款、侵吞公物，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现象，我们党进行了坚决反击，初步探索出一条反腐败斗争的有效路子，为党在这一时期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开展廉政教育，提高廉洁意识。中華苏维埃政府通过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在县、区、乡苏维埃开办培训班等渠道，拓宽廉政教育平台，提高广大干部的廉洁意识。对学员的教育，包括廉洁从政、民主作风、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反腐倡廉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以此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灵魂，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传唱至今的兴国山歌是当时苏区干部勤政为民、两袖清风的生动写照。而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背着金条乞讨”的刘启耀正是歌曲中的原型之一。

除对干部进行培训外，还有革命刊物引导、红色文艺与宣传、先进典型垂范等方式对干部进行廉洁教育。在革命刊物引导方面，《红色中华》报为苏区的廉政教育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如，1934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在第4版中，开辟“深入反贪污浪费斗争来开展节省运动”专栏，刊发了《严厉肃清贪污腐化分子》等文章。在红色文艺与宣传方面，仅苏区工农剧社就创作出一大批肃清封建思想、反腐倡廉为主题的节目，如“反对贪污腐化”“谁的罪恶”等。在先进典型垂范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1934年4月24日，《红色中华》报刊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发的《人民委员会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对节省运动和廉政建设作出部署。中央机关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苏区领导干部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先进事迹，也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而至今保存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铲田区财政部的记账本，上有1933年8月18日毛泽东来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时交食宿费的记录：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住，到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陈奇寒（涵）。这册记账本成为革命领袖廉洁自律作表率的生动见证。

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反腐体系。中央苏区时期非常注重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财经制度、巡视制度、节约制度等规章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是建立苏维埃民主制度。这是保证苏区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执行最广泛民主的一项根本制度，规定了诸如对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工作人员如不胜任工作，可根据民意讨论按程序撤换等，保障了干部群众的民主权利。二是建立财政制度。规定任何机关都必须按照财政手续办事，对随意提款、付款者则必须予以严厉处分，这是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有效手段。三是建立巡视、监察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一系列制度。1931年5月颁布《中央巡视条例》，对巡视员的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党内巡视监督逐渐走向成熟。之后，又出台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等一系列法规。1933年12月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

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贪污浪费行为制定了量刑标准，使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反法令，对贪污腐化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发挥监督作用，防止滥用权力。中央苏区特别注重加强廉政监督。1933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标志着党对纪律监察及惩治贪污腐败工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而之后建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这些专门的监察机构使党内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2年9月6日，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都必须设立控告局，承办群众的监督，专门受理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和干部的检举揭发，对群众监督的内容和控告权作了具体规定，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监督积极性。

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群众法庭”组成的群众性监督组织。这些监督组织的建立，不仅保障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民主权利，还使政府及工作人员时时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督促他们成为一心为民的人民公仆。在苏区各类传播媒体中，一般都设有舆论监督栏目，以《红色中华》报为例，此报设置“黑板”“反贪污浪费”等监督栏目，号召工农群众起来监督政府，监督栏目的文章对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及典型案例的处理结果也进行批评和曝光。另外，在民主监督方面，选民们有权对不称职的代表进行撤换或召回。

加强惩处力度，形成反腐震慑。中央苏区对党内出现的腐败行为，毫不手软，坚决惩处。毛泽东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2年5月9日，对贪污腐化的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执行枪决，同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打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枪。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瑞金县贪污腐败窝案，其中瑞金县财政部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科科长、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唐达仁被处以极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被处以警告处分。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对其他贪污浪费行为也是露头就打，坚决查处。从1932年春至1934年春，共查处200余起贪污腐败案件，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等10余名腐化分子被判处死刑。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保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今年3月以来，“淄博烧烤”火速出圈，频频登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众多旅客进淄赶“烤”，小饼、烤炉加蘸料这淄博烧烤“三件套”成为新风尚。淄博烧烤的火爆也使得淄博这个安静低调的城市突然闯入大众的视野中，网友戏称，“上一次淄博这么火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平易近民 民必归之

齐国，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城临淄，即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3000多年前，姜太公辅佐武王伐商有功，被周天子分封在齐地营丘，建立了齐国。

齐国靠近大海，许多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太公便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开启了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传统。营丘为东夷莱人的世居之地，姜太公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团结当地的夷人，“因其俗，简其礼”，使得当地人多归附于齐，齐国遂慢慢成为大国。后来淄博人热情好客的“基因”或许便源于此。

5个月后，姜太公向周公汇报齐国的治理情况，周公诧异于齐国的速度，姜太公道：“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之子伯禽受封鲁国，三年后才向周公汇报政事。周公问他为何如此迟，伯禽回答道：“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闻言，不禁忧叹鲁国恐怕要被齐国打败。后来历史证明，果真如此。

为何齐国会成为大国呢？周公道出了齐国人的成功密码：“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社会治理的好，关键就在于政府要“平易近民”。平易近民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意蕴非常广阔。既表明政令的制定要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又表明政令的施行要简便易行、不人为设限给百姓制造困难。同时又带有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民本色彩。3000年前的齐国就靠着平易近民的施政原则，柔远能迩，一步步成为东方土地上的大国。

虚车勿索 以远人

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源地，历来具有重视工商业、重视招商引资的“基

因”。2700多年前，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在淄博这片土地上主导了一次大的经济变法，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这个人就是齐国丞相管仲。

管仲是一个善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能力。齐国土地贫瘠，粮产不丰，但却盛产食盐、木器、丝绸。想要获得粮食，无疑需要商人来进行出口贸易。为了吸引商人来齐国经商，管仲先是提出降低税收等一系列措施。“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即入关的关卡和集市只征一处税，不重复征税；“虚车勿索，徒负勿入”，对没有载货的空车和背着货物的小商贩免税。与此同时，管仲还下令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专门的住宿。“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如果是一辆车，那么在住宿的基础上提供餐饮；三辆车则提供牛马所需的草料；五辆车则提供专门的服务人员。一系列的措施下，“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极大地提高了齐国的经济水平。

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管仲同时对商人作出道德上的规范，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意思是如果商人不诚信就不配做一个商人。商人的“诚”，一方面是要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另一方面是要以诚待人，以诚对待顾客。内心真诚，对待顾客才会有温情，买卖才能做长远。

事实上，2000多年前齐国商业的大发展，正是齐国与商人“双向奔赴”的结果。正因为齐国推诚心，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所以商人们才会不远万里，诚信经营，带来齐国所需的粮食，并将齐国的特产远销他国。商人对齐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某种程度来说，不完全是冰冷的交易，亦是对齐国温情的回报。

尊重人才 纳士招贤

淄博这片土地古以来就有尊重人才、重视纳士招贤的传统。2300多年前，齐威王创办稷下学宫。这所高等学府容纳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派学者。他们在这里既开展学术研究，又为齐国发展提供咨询议政的服务。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博弈，又相互交融，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中心。

《风俗通义》记载：“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史。”为招纳贤才，齐国不仅在生活上为稷下学者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给予优秀人才“上大夫之禄”，允许他们享受大夫的待遇和奉养。同时在政治上赋予稷下学者“不治而论议”的权利，允许他们议论国事、参与政事。更为难得可贵的是，齐王不拘一格降人才，即便是身份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受到尊宠和厚待。历史上齐国的名臣如邹忌、孙膑，皆是如此。前者出身布衣，后者更是刑余之人，却都位列朝班，驷马高车。在这样的人才政策下，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而稷下学宫的发展繁荣，则源源不断为齐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最终使得齐国强于他国。

民风淳厚 善良好客

民间传说，商朝时期齐国国君晋阳在出行途中受到夏家庄庄主的热情招待。晋阳深受感动，认为热情好客、大方爽朗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于是在回到齐国后大力弘扬这种美德。热情好客的传统遂在淄博这片土地上慢慢扎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便是一位典型的热情好客的淄博人。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是一位齐国贵族。《史记》记载他好客喜士，有门客数千人，每个人都各自认为孟尝君最亲近自己。对待宾客，孟尝君不吝财物，“舍业厚遇之”；他体贴备至，就连宾客的亲戚也主动馈赠；他尊重客人，无论对方是贵是贱，“皆善遇之”。因此宾客盈门，天下贤士无不倾心向往。

宋朝皇帝的人文修养

宋亮遇到了宋孝宗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布衣陈亮直接上书，谈论恢复中原对策。孝宗皇帝看了书奏，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于朝堂之上以激励群臣，并召见陈亮，拟予以破格重用。但是，这一篇奏议，却招致妥协派大臣的忌恨，“尤恶其直言无讳”。由于他们诋毁阻挠，起用陈亮之事终究泡汤。陈亮十分失望，快快回归故乡，不时借酒浇愁。一次，他与某狂士携带一位乐妓到萧寺饮酒。酒喝多了，狂士便称乐妓为妃子。旁边有一位酒客随即撺掇狂士：你既然封了妃子，那么谁为宰相？狂士用手比画说：陈亮为左相，你为右相。用你俩做两个宰相，大事可成矣。于是，酒客让狂士端坐大殿中央，他与陈亮一左一右上奏拜；乐妓捧着酒杯，唱起了《降龙》。歌毕，三人齐声欢呼“万岁”。

狂士过了一把“皇帝”瘾，陈亮过了一把“宰相”瘾。

殊不知，那个酒客别有用心，故意

给陈亮挖坑。“封妃拜相”结束，那个酒客随即跳过县州衙门，直接进京城（临安）到刑部投诉，指控陈亮图谋不轨。陈亮曾参加科举考试，因考官何澹不喜欢他的文章，致使名落孙山。陈亮内心不服，对考官颇有微词；有人传话到何澹处，何澹非常恼火。不久，何澹转任刑部侍郎。那个酒客知道陈何之间有此过节，故而越级上告。何澹接到诉状，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将陈亮与狂士抓捕，投入监狱。何澹公报私仇，下令严刑拷打，把陈亮打得体无完肤，最后又将案情上报孝宗皇帝，建议判处死刑。

孝宗皇帝接到奏报，并没有马上批复。看到陈亮的名字，孝宗皇帝想起那篇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奏议，陈亮满腹韬略而未见用，又不免替他遗憾。对于身陷囹圄的陈亮来说，其生死系于皇帝一念之间。孝宗皇帝对身边侍卫说：人命关天，陈亮案子不可轻易决断，你们迅速去陈亮家乡暗访，查清事实真相。调查结果表明，所谓“封妃拜相”，不过是一场闹剧，借酒作乐而已；陈亮并没有不轨之心，倒是告发者不怀好意。所以，当何澹等大臣请求法办陈亮时，孝宗皇帝断然回答：“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皇帝一言九鼎，陈亮与狂士终究被无罪释放，两人昂首携手走出监狱；虽饱受皮肉之苦，但无性命之忧。

假如陈亮生活在明清并发生类似事件，恐怕在劫难逃，不仅他本人被千刀万剐，而且株连九族，一大拨亲眷也不免与他一起送死。在盛行“文字狱”的明清，任何人说话或书写，一不留神就会招致杀身之祸。陈亮参与“封妃拜相”，竟敢以“宰相”身份朝拜“皇帝”，虽是酒后逢场作戏，其言行确实大逆不道。陈亮被朝廷弃用，自觉怀才不遇，也可能萌生谋逆之心。是故，其